

门洪华 主编



资深国际问题专家
解读中国外交风云变幻

ZHONGGUO WAIJIAO DABUJU

中国外交 大布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经60余年的艰辛探索，一步步迎来辉煌，开始以平和、稳健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看待世界，一种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兼具的成熟外交哲学正在成为中国崛起的内在动力。



中国外交 大布局

ZHONGGUO WAIJIAO DABUJU

门洪华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外交大布局 / 门洪华主编.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7-213-05239-2

I. ①中… II. ①门… III. ①外交史—中国 IV. ①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1929号

中国外交大布局

作 者: 门洪华 主编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 (0571) 85061682 85176516

集团网址: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http://www.zjcb.com>

责任编辑: 王 芸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责任校对: 鞠 朗

电脑制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豪波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1.5 万 插 页: 1

版 次: 2013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5239-2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 中国外交哲学的历史演进

1

- 探究中国外交哲学的意义 / 2
- 中国外交哲学的基础观念 / 3
- 中国外交哲学的当代体现 / 9

● 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变迁

2

- 分析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理论框架 / 14
- 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形成(1949—1966年) / 15
- 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在曲折中发展(1966—1976年) / 19
- 中国外交决策机制逐步改进(1976—1989年) / 23
- 中国外交决策机制走向成熟(1989—2012年) / 27

● 中国外交战略与大国进程

3

- “一边倒”战略 / 34
- 争取“中间地带”战略 / 39
- “一条线”、“一大片”战略 / 42
- 不结盟、全方位的和平外交战略 / 47
-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 / 52
- 和平发展的战略框架 / 58
- 中国制定和实施外交战略的基本经验 / 63

● 中国大国关系的演变与发展

4

- 中国处理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路 / 68
- 1949—1978年的中国大国关系 / 70
- 1978—1988年的中国大国关系 / 72
- 1989—2001年的中国大国关系 / 75
- 2001年至今的中国大国关系 / 77
- 中国大国关系的前景 / 82

● 中国周边外交的历史演变

5

- 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周边外交 / 86
-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的进展 / 95
- 迈向周边外交的新高度：构建和谐周边 / 105
- 当代中国应对周边地区形势的若干思想启示 / 117

●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历史演变

6

-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初创与成就 / 124
-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调整与拓展 / 129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调适与深化 / 134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世界意义 / 142

●中国外交布局中的多边舞台

7

多边主义与多边外交的基本内涵 / 153

中国多边外交的曲折历程 / 155

中国的多边外交时代即将来临 / 182

●中国融入与塑造世界经济体系

8

中国国际贸易的两极格局(1949—1971年) / 193

融入与重塑东亚经济秩序(1972—2001年) / 1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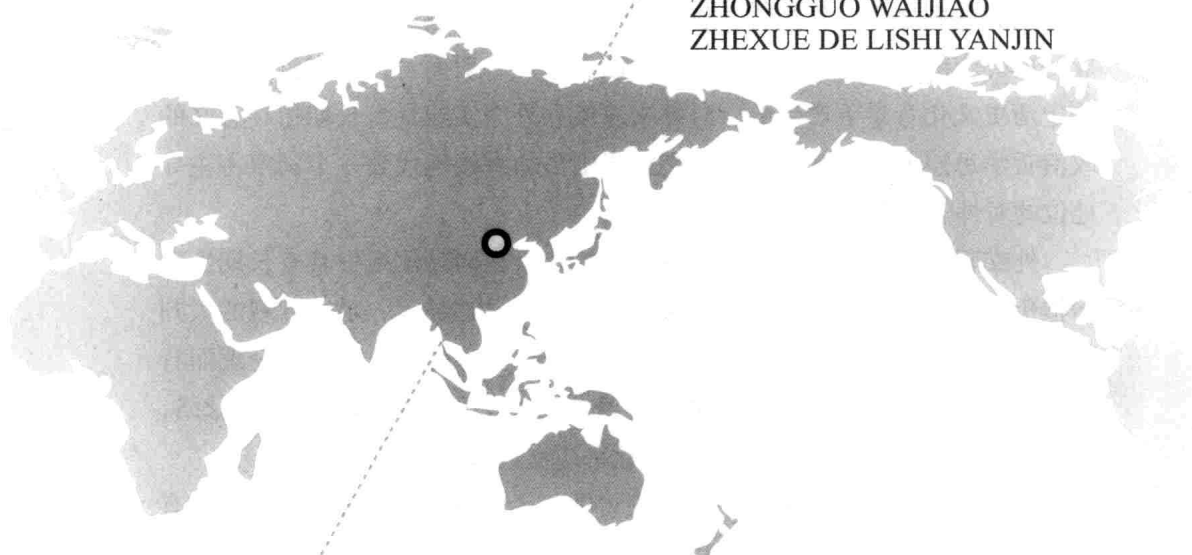
塑造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2002—2012年) / 208

后记 / 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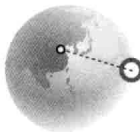
中国外交哲学的 历史演进

ZHONGGUO WAIJIAO
ZHEXUE DE LISHI YANJIN

1



门洪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 60 余年的韶华，历经艰辛探索一步步迎来辉煌，开始以平和、稳健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看待世界，一种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兼具的成熟外交哲学正在成为中国崛起的内在动力。

探究中国外交哲学的意义

大国外交战略有两重任务：一是尽量保护自己的利益，二是尽量扩大自己的影响，一国外交的影响力最终同它的现实或潜在的实力成正比。^①在这些实力基础之中，外交哲学思想无疑是最具有深远影响力的软实力，构成一国外交的哲学思想基础和现实判断背景。一般而言，外交哲学指的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对外交决策和外交实践具有长期指导意义的政治哲学思想或价值观念，而外交思想则更加直接地代表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对外交图和该国的总体利益。

外交哲学构成外交的哲学思想基底。一个在国际体系中具有长期性政治抱负的大国，其外交政策需要某种哲学，即足够长远、足够宏观的大判断，为长期的外交实践提供根本性的战略依据。这种从长远来看合理而有利的外交哲学，必须符合国际体系本身相对经久的结构特征和历史脉络，并据此恰当地判断本国在此结构与演化中应有的根本位置。

中国的外交哲学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又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有着直接的关联。曾经，中国以和为贵的主导外交哲学在国贫民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屡屡碰壁，甚至不能实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使命，中国外交哲学有所嬗变，却未失其传统底色。在全球化和复合相互依赖的加深的情势下，中国传统外交哲学有着全球性的适应力。当前国际形势的具体表现是，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诸领域形成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与状态，相互依赖在经济上的表现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一个行为体都难以获得独自发展，要受到诸多行为体和相关因素的制约；在政治上，国内政治国际化、国际政治国内化，超国家权力日益强化；在文化上，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范围更广、领

^① 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7 页。

域更多，全球文化景观随即出现端倪。^① 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且战略思想体现出与时俱进的创新品质，中国外交哲学随之出现嬗变，一种强调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并重（以韬光养晦为哲学原则、以有所作为为实践原则）、多边主义与双边主义相协调、更加关注国际形象的成熟外交哲学正在形成。

中国需要有从长远来看合理的和有利的外交哲学，它一方面足以在政治文化意义上构成经久扎根于全民族意识内的对外传统；另一方面能够在基本政策意义上构成整个历史时期内的最佳大战略，据此开发、动员和运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精神资源来实现其根本的对外目的；它还必须符合国际体系本身相对经久的结构特征和演化脉络，并且据此断定本国在此结构和演化之中应有的根本位置。^②

中国外交哲学的基础观念

中国的外交哲学源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又受到历史经验、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以下，笔者将从哲学观、时代观、秩序观、格局观四个方面具体剖析中国外交哲学的基础观念。

在哲学观上，中国外交深受“仁”、“礼”、“中庸”思想等的影响，并以“和而不同”为主要体现。孔子的仁、礼等哲学思想长期作为指导中国处理对外交往的原则，和平、中庸哲学观念也长期影响中国的外交活动。“仁”是儒家思想核心理念。孔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仁”不仅是个人修养的至高境界，同时也是对国家及天下秩序的设计，这就是所谓“家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设计。“仁”不仅强调自己的修身养性，还强调其他国家的“自我教化”，认为将本国的意志强加给他国属于不仁之举，因此“学而不拒，不往教之”。“仁”的观念与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战略有着直接的关联，所谓“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礼”视天下为同心圆等

① 蔡拓：《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16—27页。

② 时殷弘：《风物长宜放眼量——论中国应有的外交哲学和世纪性大战略》，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13—20页。

级结构，以其辐射程度确定等级关系，形成朝贡体系，所谓“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中庸思想实际上就是“仁”、“礼”思想的体现和延伸，中庸之道被视为中国人的主导观念和行为准则。《中庸》强调，“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非礼不动”等。中国传统哲学以“和”为重心，所谓“协和万邦，以和为贵”，“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和而不同”。中国外交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和平”外交，这与中国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从文化传统上看，中国自古就形成了热爱和平、善邻容恕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以和为贵”，即天下太平、和睦相处最为重要。儒家伦理奉行了两项基本原则，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后者还引申为“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睦邻思想。所谓“和而不同”，即各种文明、各种制度、各种发展道路相互尊重，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这一哲学观念表现在实践上，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以及和平发展道路的设计。其中，和平发展道路反映了进入21世纪中央领导集体的战略思维，规范着中国政治、外交乃至军事路向。和平发展与“和而不同”构成同一理念的两个方面，发展源自和平，和平推进发展，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概言之，中国外交哲学观念以“和”为中心，顺应中国崛起的潮流，进一步强调“收敛锋芒、善与人同”的和为贵思想应视为未来中国外交的哲学思想重心。

在时代观上，中国尤其体现出外交判断的长期性、长远性、独特性。对中国外交而言，揭示国际社会历史发展的走向及其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确立客观的时代观是国际关系研究和外交学的基本理论课题。中国对时代问题的判断，经历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通过对世界形势的分析，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处于革命

和战争的新时代”。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受到苏联越来越严重的军事包围，更加强调当时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而且进一步引申出“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的论断，直到中共十一大，仍然强调“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对外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对时代特征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84年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②1985年6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指出，“在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③1987年中共十三大文件开始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到中共十四大和中共十五大报告才更多地使用时代特征和时代主题。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重申：“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强调：“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005年9月、2011年5月，中国先后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和《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全面阐述了中国和平发展战略。

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反映了中国对世界发展本质特征、当代国际关系基本内容的认识，揭示了世界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时期，引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从以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向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重大转变，确定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和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不仅使中国避免了苏联东欧剧变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而且确保了中国崛起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中国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并不意味着中国认为这两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而是强调这是有待解决的时代难题。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谆谆告诫：“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3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③同上，第126—127页。

一个也没有解决。”总体而言，中国对国际局势的判断是，当前世界局势发生新的变化不稳定因素增加，世界和平与稳定面临新的威胁与挑战。但是，国际形势总的继续趋向缓和，要和平、求发展仍然是世界各国的强烈愿望和时代要求。

中国的秩序观体现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历程以及中国从国际社会的局外者到局内者的角色转换。19世纪中叶之前，中国一直处于东亚相对封闭的地区秩序之中，并长期承担东亚地区秩序塑造者的角色。之后，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强行纳入世界体系，开始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历程。其间，中国的角色几经变换，从身处边缘、被动、消极参与到积极参与、主动建构，中国与国际秩序的互动构成了一幅纵横交织、由淡至浓的画卷。这个过程恰恰伴随着中国走过百年艰辛、开始民族复兴与崛起、走向现代化。同时，国际秩序也处于扩散、完善的过程之中，逐步呈现出世界性、全球性的特征。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秩序进入新的转型时期，各主要大国、国家集团纷纷就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设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且付诸实践。概言之，中国的现代化进步、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发展似乎相约而行，这既给中国的未来发展提出了重大挑战，也为之提供了广阔的全球空间。

中国参与国际秩序的建设始自联合国的筹划，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几经变换，尤以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为中国主动、积极参与国际秩序建设为制高点。中国一贯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并且为之做出过杰出贡献。1974年邓小平在第六次特别联大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自此，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在不断充实、发展、演变并日臻完善。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必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一主张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年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扬。2003年5月28日，胡锦涛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阐述了对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五项主张：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重要作用。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对待国际秩序的观点更加辩证。中国认识到，既有国际秩序以西方为主导，确有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但

中国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已呈逐步上升之势。此外，中国进一步客观评估现有国际秩序的利弊，认识到在现有联合国为主导的全球性制度体系中，中国在政治方面占据较明显的有利地位，经济方面也越来越利大于弊，现有国际秩序对中国而言是一柄双刃剑：随着中国全面参与国际社会，它促进了中国实力的增长和利益的维护；由于现有国际秩序是固有权力、利益格局的产物，它也对中国的实力增长和利益拓展构成了限制。在此情况下，中国应以负责任的大国身份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设与变革，以渐进的方式、和平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改革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不公正、不合理的方面，而非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与此同时，中国也进一步认识到国际秩序建设的艰巨性，从务实的角度积极推动东亚地区秩序建设，并思考国际秩序建设的新思路。2005年12月，《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第一次放弃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提法，代之以“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此后的十七大报告、十八大报告都延续了这一战略思路。这表明，中国愿意以负责任的大国身份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以渐进、和平、民主的方式改革国际秩序。

综上所述，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就是国际秩序的积极变革者。中国曾经被排斥在国际秩序的决策之外，它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经历了一个从旁观到参与、从消极到积极的过程。其间，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认识得以逐步深化。中国崛起已经冲击并改变着国际实力格局、利益格局；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安全观、国际关系民主化、文明多样性、和谐世界等成为影响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观念性因素；随着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不仅成为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全面参与者，而且积极参与并主导地区制度的创立，中国与国际制度之间呈现良性互动，这些都促进了国际秩序的建设。概言之，中国的崛起必然冲击现有的国际秩序，而现有国际秩序恰处于转型时期，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几近同步而行，中国有必要也有机遇就如何完善国际秩序提出自己的见解，力争成为国际秩序的重要塑造者。

在格局观上，中国强调两极格局已经被打破，多极格局尚未形成，并积极推动世界多极格局的出现，体现了中国外交哲学的高瞻远瞩。实际上，多极化本来就是历史的发展趋势，随着欧洲国际体系的扩展，世界大国的

候选不再局限于欧洲，而是逐步扩展到其他地区。19、20 世纪之交，日本成为欧美之外第一个被承认的大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成为欧美之外被承认的第一个大国；20 世纪 70 年代，尼克松提出五大力量中心说；展望未来，中国、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都可能成为新兴力量中心。所以，多极化不是冷战的产物，而是对世界发展趋势的总体概括。多极化格局的一个标示，就是多重权力中心的存在，^①而多重权力中心的存在，源于地区主义的发展。今天蓬勃发展的地区主义就是明日多极世界的曙光。

冷战结束导致两极世界格局的解体，作为唯一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并没有垄断一切，但美国人确实展现了建立单极霸权的野心，力图将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变成单极时代。但更多美国学者理性地看待世界的发展趋势，认为多极格局有着更大的可能性。例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指出，目前全球政治已经从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走向一个单极体系时期，眼下正经历 10 年或 20 年的单极 + 多极体系，直到 21 世纪进入一个真正的多极体系。在两极世界，其他国家欢迎美国充当它们的保护人，以抵御另一个超级大国；而在一个单极 + 多极体系中，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当然构成对其他大国的威胁。^②最早指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大国领导人是邓小平。1990 年 3 月，他明确指出，“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③中国是支持多极化判断和促进多极化趋势的最力者。在中国看来，世界格局处于过渡时期，其特点是一超多强，一超的力量在膨胀，多强的力量也在发展。所谓多极化，应该是一超与其他强国之间的差距缩小而不是扩大的趋势。首先，从数量上看，多强的数目在增加；其次，从国家实力的角度看，有的强国国家实力增强显著；其三，从结构上看，地区一体化的趋势增强，地区整体力量和对外整体声音增强。多极化首先是一种客观现象，同时也是一种主观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他大国、第三世

① 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与未来》，新华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77 页。

② Samuel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2, March/April 1999, pp.35-49.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53 页。

界国家的利益需求。中国认为，多极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第一，多极化趋势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大国之间建立和发展平等关系，形成一个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第二，多极化是发展中国家地位上升的结果，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第三，有利于世界的繁荣与发展，各国都极其重视维护和拓展经济利益的发展环境，从而促进了和平稳定与经济的繁荣发展；第四，有利于中国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为中国提供了进行现代化建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机遇。鉴于此，多极化成为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构成了中国对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国际形势的总判断，是中国制定外交战略的基本依据；多极化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表明中国对多极化的一种价值判断；中国要积极推动多极化趋势，构成中国外交战略的一部分，“对其他战略有着重要的基础性意义”。^①

中国外交哲学的当代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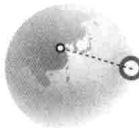
中国外交哲学既体现了传统哲学思想的继承，又不乏新时代的嬗变。当代中国外交哲学主要体现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双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协调等方面。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经过了一个逐渐丰富和走向完整的过程。可以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独立自主”与“和平”这两个词都属于中国外交思想的核心，集中体现了中国在外交方面最基本的诉求，它既是基于历史经验，也是基于现实的需要。^②在过去 60 余年里，中国外交随着国际形势变化有过几次重大的调整，但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根本立场、维护世界和平的目标、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主张等。

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和根本出发点。和平作为中国外交的根本追求，则主要体现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倡导和实践上。和平

^① 叶自成：《对中国多极化战略的历史与理论反思》，载《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1期，第9—23页。

^②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4—19页。



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内容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它是中国根据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结合战后国际形势发展的新情况而提出的适用于处理同一切国家关系（包括处理相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的崭新国际行为准则。毛泽东时代的独立自主外交原则是通过结盟战略来体现的，在与大国的结盟中首先要坚持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如 20 世纪 60 年代中苏关系的破裂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坚持维护独立自主权益的必然结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基本点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国外交战略随即进行了调整，进一步确立独立自主外交的主导地位。20 世纪 80 年代，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重新评估国际形势，提出了“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将中国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目标下，中国领导人大幅度调整了外交政策，不再主张战略联合，提出以“三不”——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为原则的独立自主外交战略。1986 年 3 月，中国领导人在《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首次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说法。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表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为中国追求和平国际环境与内部发展的有机联结。^① 概言之，中国根据国际形势和国内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基础上，发展了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通过同时加强双边磋商和多边合作的方式进一步推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成熟，出现了被西方学者称为“准结盟”战略的新表现形式。

中国外交以双边主义为基本传统，这是中国历史经验的经典总结，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20 世纪 90 年代特定的国际形势分不开。强调多边主义似乎是近年来中国外交的突出特点，与中国外交哲学的嬗变有着本质的关联。当然，中国早有多边主义的外交实践，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战略均属于多边外交的范畴；中国加入并参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外交实践亦属于从事多边外交活动。但总体而言，双边外交一直是中国外交战略的主导模式，近年来，随着中国全面参与国际社会，多边外交才逐步引起中国的重视，尤其是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加强与东亚地区的政

^① 许志嘉：《中共外交决策模式研究》，水牛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1 页。

治经济联系，加强在东亚的地区制度塑造能力，中国对多边外交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将双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相结合视为重要的外交实践模式。

对中国而言，多边主义有着不可或缺的战略意义。且不论仅仅奉行双边主义外交所可能存在的缺陷，仅仅从总体上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疑虑而言，实行多边主义外交亦是必需的。多边主义有助于化解各国尤其是相邻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从根本上摆脱彼此间的安全困境，创设广泛的和平稳定的地区乃至全球安全环境。鉴于此，通过多边主义实现世界大国的宿愿是中国的必要战略选择，它有助于我们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更加积极的外交行动，更加有效地维护国家战略利益。中国对多边主义的积极态度可以从对东亚地区一体化的推动上体现出来。当然，在这个进程中，传统双边主义的战略亦进一步体现其价值，例如中日关系应被视为东亚一体化能否成功的前提条件，中美关系亦可视为最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我们认为，多边主义有助于缓解东亚各国间的猜疑和恐惧，增进彼此间的互信程度。东亚众多安全困境形成的一个普遍原因就在于处于安全困境的双方之间缺乏互信。与单边主义不同，多边主义不是在损害他国安全利益的前提下的对自身国家利益的盲目追求，而是强调维护行为体之间的共同安全利益以及维护整体安全利益的责任；与双边主义军事同盟的针对性和排他性不同，多边主义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多边主义有助于东亚各国形成对安全规则的集体认同，促进地区安全制度的形成。^① 中国作为东亚地区性大国，要实现成为世界大国的战略目标，就必须首先成为推动东亚一体化的主导性力量，通过多边外交逐步实现大战略目标。我们不否认推行多边主义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束缚自己的手脚，但它同样也会束缚其他国家的战略选择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② 因此，加强地区国际制度的主导塑造能力以服务于长远国际战略利益就成为中国推行多边主义外交的核心目标。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多边主义往往是低效的，国际制度常常软弱无力，国际规范往往得不到遵守，因此，秉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理念，我们强调双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相结合，并继续保持双边外交的主导地位，一切以国家战略利益的维护与拓展为依归。

①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56.

② 类似的观点参见 Joseph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57-160.